

■钱莊

如果说西安秦皇兵马俑、三星堆文物已是万众瞩目，作为我国2024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安徽淮南武王墩墓地遗址，关注的热度刚刚开始。随着目前一号墓的发掘，楚文化政治格局与礼制变迁的里程碑式的标杆浮出水面；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、玉石器及丝织物等，堪称战国晚期楚地艺术的巅峰。有专家认为，它将同前两者齐名，成为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又一重要发现。

那么，在我们尚未实地领略更早于秦汉的气象前，黄山书社率先推出了一部揭秘墓主生平纪事的专著，它既可作为武王墩墓地遗址的导读，更是楚国最后一位雄主的传奇——这本书就是长年专注于楚文化的研究者沈国冰先生的《考烈王》。

也许在浩瀚的历史星空里，考烈王熊完已属当下鲜为人知的一颗孤星，但战国史上他曾经的耀眼，绝对无法被淹没。如作者所言：“考烈王是战国晚期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。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，他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王者。考烈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。”

推荐《考烈王》，首先在人物的立体性定位上。把对人的纵向追寻摹画，凸现于风云变幻的历史图卷，因此人的形象才生动而丰满。考古学家宫希成就此感叹道：“本书一覽武王墩墓主人考烈王波瀾壮阔的一生，傾讀楚國晚期困強中心的奋起，看盡八百余年楚國最后的余晖。”于是，在强秦崛起的背景下，这位王者如何以坚韧与智慧，维系楚国八百余年基业？他又如何书写楚国最后的辉煌与悲壮？这样的历史诘问，在书中自会找到答案。

推荐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是，书中史料性、知识性与可读性完全融合。对于战国时代的大背景，楚国盛衰的发展脉络，作者仿佛有一支素描笔，清晰质地将其勾勒出来，称它是“极简楚史”也不为过。同时，作者在主线索周边，又简洁灵活地穿插进读者所熟知或未知的同代人物，尤其是一些相关典故及成语来由的知识，巧妙地丰富了阅读信息。更难得的是，宏大的历史事件记叙里，也不乏关键节点的微观细节描述，于是就避免了枯燥艰涩，读来轻松并引人入胜。

时下历史题材的书籍，大凡两类：严谨厚重的学术文史专著，借史为素材的通俗读物。《考烈王》却明显在探索一条新路，可谓“考古视角的文学手笔”。不难看出，作者的原则是基于翔实史料，视角是考古挖掘式的，绝无“戏说”之嫌。但结构和语言又无疑汲取了诸多文学的元素，所以笔下的文字形象鲜活，可读、可悟、可感。作者自己说是“历史随笔”，实际呈现则“神严形随”，特别谋篇布局数次出现“蒙太奇闪回”的横切面，不仅抛开“掘墓案宗”式的行文习惯，而且自然融入颇多个性化的诗性思辨，无疑更好地调动起阅读的感性体验，和思考历史的多种维度。

相信读过本书，读者惊叹之余，一定会生出更多从文本到实地、到遐想的追源热望。

《考烈王》  
沈国冰 著  
黄山书社

## 考古视角下，武王墩的人文回响

# 文以载道，万斛泉涌



“文以载道”贯穿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主线。  
视觉中国供图

■郑从彦

## “文以载道”并非空洞的口号

“文以载道”的实质是在文学中贯注理性精神，折射出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互为表里的历史现实。朱刚教授指出，“‘文以载道’的实质，是要求在文学创作中贯注理性精神”。这一论断精准地把握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。在韩愈“长江秋注，千里一泻”、欧阳修“容与闲易，如秋山平远”、苏轼“万斛泉源，随地涌出”等文学盛景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多样呈现，更是理性精神在文学中的具象化表达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“文学的真正独立，并不系于某种‘纯文学’之观念，而

是根本地来自士人立说持论的独立精神”，这一见解深刻揭示了“文以载道”与文学自觉之间的内在关联。因此，“文以载道”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，更是士人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。

朱刚以“文以载道”为轴心，深刻剖析了柳宗元道论对传统儒家体系的突破与重构。柳宗元在《天爵论》中明确提出“善言天爵者，不必在道德忠信，明与志而已矣”，将“明”（智能）与“志”（意志）并列为人根本禀赋。朱刚敏锐地指出，这一重构“把晚期的‘原情为本’更推进一步”，使道的内涵从道德规范转向自然人性，体现了“文”承载之“道”的革新。在政治层面，柳宗元通过《六逆论》主张“贵不足尚，亲不足与，旧不足恃”，朱刚认为这彰显了“尧舜之道超越周礼”的实质——以“贤贤”取代“亲亲贵贵”，使“文”成为批判礼教、倡导社会平等的载体。朱刚进而揭示，柳宗元道论“与他的关于天不能赏善罚恶的唯物论思想，保持了严密的一致性”。通过分析《时令论上》中“圣人之道，不穷异以为神，不引天以为高”的论述，朱刚论证柳宗元将“道”彻底植根于人文领域，使“文以载道”从传承教条转变为革新思想的工具。这一解读准确把握了柳宗元以古文为载体，构建新型道论体系的思想史意义。

“文以载道”并非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具体体现在四大家对“道”的理解与文学实践中。“文以载道”在韩愈这里，既是文学创作的宗旨，也是士人实践其政治理想与伦理追求的方式。朱刚教授通过对韩愈《原道》的研究，揭示了其“定名一虚位”论背后的名实之辨与天人关系。他指出：“‘名’是属人的，‘位’是属物的。

‘位’与‘名’的关系，也许可以把‘位’称作某种‘应当的名’，它向着人们要求给予适当的‘名’来符合它的‘实’。”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韩愈道论中名实关系的复杂性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韩愈的“道”“是靠著‘师’来传授的，师在道在，师亡道亡”，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道学中“道”作为先天存在的预设，强调了人在道统传承中的主体性。

## 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

“文以载道”在欧阳修与苏轼手中进一步发展为对“至理”与“自然之全”的追求，体现出宋代士人理性精神的深化与成熟。朱刚认为，欧阳修虽也有激昂慷慨之语，但因为他的“道”已从文化价值更推至自然、人情之“真”，以“至理”的面目出现在文章里，所以，他不必借气势压人，而可以平心静气地摆事实、说道理，“引物连类，折之于至理，以服人心”。这样，他的文风便会平易自然、流畅婉转，更具理性之风范。朱刚教授以苏轼的月亮之喻为例，精辟地阐释了其道论的内涵：“‘盈虚者如代，而卒莫消长也’……这里‘卒莫消长’指的不是月球，而是‘月’这个抽象的总名。”这一分析揭示了苏轼道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，苏轼的“道”已是造化中所蕴含的“美”的“无尽藏”，这种“道”无处不在，所以触处皆春；再加上他的“性命自得”的通达境界，远大的“器识”和越来越深刻的对人生的反思，最终觉醒为主体性的高扬，于是他的文风便不但有“万斛泉源，随地涌出”的挥洒之妙，并且能

以理性的思致为其精神，一步步脱落华饰，现出气骨。从欧阳修的“至理”到苏轼的“自然之全”，“文以载道”的内涵不断丰富，不仅推动了对宇宙、人生、历史的理性思考，也促进了文学风格向更加自由、深邃的方向发展。

“文以载道”并非压抑文学的情感表达，而是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寻求平衡，秦观的“词心”正是这一张力的典型例证。朱刚教授认为，“‘词心’是宋人损之又损而不能化解的块垒，是人生的非理性之冲动的最后浓缩处”。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宋代文学中理性与感性的复杂关系。作者进一步分析道：“‘词心’对于秦观，既是痛苦的渊数，却又因其浓重、执着，也成了他的生命力所在。”这一辩证分析深化了我们对宋词审美特质的理解。秦观的词作证明，即使在理性高扬的时代，文学仍为人性的幽微与情感的挣扎保留了空间，这正是“文以载道”传统的包容性与丰富性所在。

“文以载道”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准则，更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政治抉择与人格塑造，苏轼的“大节观”正是其道学理论在现实中的践行。朱刚教授从苏轼的文章中提炼出作为“自然之总名”的“道”，并精辟地论证了其与政治抉择的内在联系：“从作为自然全体之总名的‘道’到‘天下之大节’，是有逻辑联系的，即在‘全’上推出‘大’来。”这一分析揭示了苏轼道论与其政治实践的内在一致性。作者进一步引用黄庭坚的赞语：“计东坡之在天下，如太仓之一稊米；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则与天地相终始。”这一形象的比喻生动地展现了苏轼在“大节”问题上的坚定立场。由此可见，“文以载道”在士人实践中，既是对文学的要求，也是对人格的锤炼，是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。

## 文学传统的新路径

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独特魅力体现在多个层面，堪称一部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典范之作。首先，“天津图书奖”获奖者朱刚教授的经典著作再版，本书通过柳宗元、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的道学传承，系统折射了中晚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脉络，重现了士大夫精神的内核。其次，全书以文学与哲学对谈的方法，深入探讨了“文以载道”这一历史命题，展现出深厚的学理基础与跨学科视野。第三，作者通过四大家的个案研究，生动刻画了他们作为文学家、哲学家与政治家的立体面相，使读者得以窥见唐宋士人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。第四，文献考辨功力深厚，依据《全唐文》《四库全书》等大量原始材料，补正前人研究之不足，展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。第五，全书结构精巧，逻辑严密，论述磅礴而优雅，既有扎实的学术功底，又不失灵感的闪现，读来酣畅淋漓。这些特点使本书不仅成为专业研究者的重要参考，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唐宋文学与思想的经典读本。

《文以载道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》是一部立足于深厚学术积淀，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杰出著作。朱刚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与缜密的论述，不仅重新诠释了“文以载道”的内涵，也为我们理解唐宋士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传统提供了新的路径。本书的再版，不仅是对经典学术成果的传承，更是对当代读者思想视野的拓展。在浮躁的学术环境中，这样一部沉潜深厚、充满理性光辉的著作，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，它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学术研究，始终是对真理的追寻与对人文精神的坚守。

# 一位哲学家留给世界的爱与思

■臧峰宇

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是朱锐教授的哲学绝唱。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他在《艺术与人脑》课堂上授课的情景，他在学生们面前微笑着。学生们在课堂上不仅思考艺术与

人脑关系的问题，更能接受来自哲学深处的生命教育。这是一本谈论生命与死亡的书，朱锐从“为什么哲学家不惧怕死亡”谈起，认为生死问题是哲学最大的问题。在生命最后的日子，他“在有限中寻找无限”，讲述对哲学与生死的内在理解，作为“走之前对社会的关怀，还有我的爱”。他想象着生命中各种图景，讲到生命图景中的时间，分析生命中的小大之辩。在对他深表感佩的同时，我深感思想能够通达生命的本质。哲学让人们了然生死，在向死而生的途中超越自我。这门课来自生命深处的豁达，深切表明哲学家对这个世界的深爱

和勇气、表明对自我和世界的信念，而未经审视的生活似乎是不值得过的。朱锐对死亡的探讨，从另一维度书写着他对生命的爱、对教育的爱和对世界的爱。这本书是他留给学生的爱与思，他喜欢旅游、爬山、摄影……对音乐、美术、脑科学、人

工智能有很深的理解，在丰富的体悟中表达着对生命的爱。他在“最后一课”中讲授的是自己用整个生命验证、体认智慧的过程，从哲学角度表达了对存在本身的深切关怀，也向同学们展现了生命最本质的价值。其生命最后的岁月与学术追求和教育使命融为一体，关乎选择的勇气、承受苦难的韧性以及阐明真理的力量。在传递“向死而生”的领悟中，他唤醒了此在的“本真性”，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严肃地体验生命与面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。

在这本书里，朱锐并非复述哲学史上的片段，而是旨在点燃学生们爱智慧的激情，令人深切感受“生命”对“生命”的触动，关乎价值判断、人生意义以及在现实的世界中如何安身立命。从中可见，生命的有限性并非某种消极的否定。在“最后一课”中，朱锐告诉学生们：因为时间是有限的，选择才有分量；因为生命会终结，对意义的追寻才如此紧迫。不要忘记，哲学是一项严肃的思想事业。作为一个走在生命旅途上即将抵达终点的思想者，朱锐与学生们分享的是他的生命见闻、困惑与领悟，这种分享建立在人的有限性与对无限意义的渴求上，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质的思想“对话”。

朱锐喜欢教书，想把更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。他说讲课是他的本分，也是他的激情所在，希望把自己最后的时间奉献给学生们，传递哲学的思想力量。在生命最后的一个春天，他几乎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理解和讲授死亡，表示“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”，实则用有限的生命做在他看来最有意义的探索。那时，我像以前一样去听他的课。他的声音有些弱了，但讲得还是那么有激情。课后我们谈到哲学教育的内在本质，他说自己的研究生都很出色，希望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……

在学校毕业典礼上，他在视频发言中为全体毕业生寄语，有一段话至今令很多在场的师生们记忆犹新：“无论你以后在哪里，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，是高还是低，是大还是小，是搀扶摇直上九万里，先图南，后适南冥，还是振飞不过数仞而落地，翱翔蓬蒿之间，尽显彼此妥适焉的风流或怡然自得，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，并且凭借你的善良、智慧和人该有的坚韧不拔，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，因为你而闪烁。”他嘱咐学生们要勇敢、要坚持、要关心他人、要为社会作贡献、要做一个善良的人。当被告知还有不多的生命时光时，他选择住在安宁病房，并在这里讲述了“最后一课”。讲这节课之前，他约我到病房见

面。他说：“对话是最好的告别，自己度过了极好的一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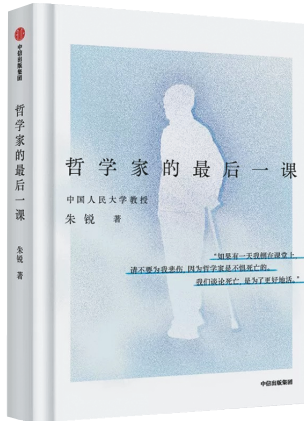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我和他的交往，深感他对哲学研究有着深切的爱。有新发表的文章，他会把电子版发给我，其中有关于火和工具理性，以及视觉和艺术中关于光的哲学原理。我曾建议他主编《哲学与认知科学明德讲坛对话实录》，他很快就将文稿整理出来了。在这本书出版前，他把封面设计发给我征求意见，并表示“大大的学生给了我写作的热情”。在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微信中，他希望我帮他处理与哲学和认知科学平台有关的具体工作，我答应他处理好。得到他逝世的消息，我和同事们起草讣告的时候，联想到《斐多篇》中苏格拉底的遗言：“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。去买一只，别疏忽。”一位哲人最后向我说起的大概也是一只公鸡——他把死生契阔和那只象征具象现实的“公鸡”等量齐观。在生命最后的日子，他关注的是尚未毕业的研究生，是未竟的学术研究。他在病床上录制了“最后一课”，在微信中和我谈起关于科研平台的未了之事，不久，走向了哲学与生命的深处。他的姐姐朱素梅教授告诉我：“朱锐走得安详。”

这本书展现了“最后一课”所具有的深意。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哲

人，向学生们作最后的演讲，在问答和告别中阐明生命的内在价值。学生们在这时体验到的不仅是一门课程的结果，更是一个思考阶段的过渡，由以反思自己的学习之旅，深思如何有勇气运用自己的智慧，以及哲学研究之于人生所具有的意义。这门课的讲授是浸润式的，是深邃而持久的，它将一直铭刻在学生们记忆中。这让我们感到，教育可以促进人们对生命的内在思考，而生命内在价值的彰显也有赖于贯穿人生的哲学教育。这门课或许反映了朱锐学术生涯的圆满，也是在场的学生们深思哲学与人生的难忘的思想时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朱锐不仅在讲授“最后一课”，更是在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，以一种庄严的方式点亮爱智慧的烛光，在思想对话中铭刻一份记录，由此呈现了一堂关于“如何生”与“如何教”的哲学课。这堂课的回声，将长久在我们关于生命价值与教育本质的思考中激荡。

敬业立学，求是创新，乐教爱生，在生命教育中启智润心，这是我记忆中的朱锐教授。他心有大我、甘于奉献，他的大爱超越凡俗。在沉思和感悟中追求生命的价值，向生命的总体性敞开，使一种创造性的生命走向完善。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位哲学者面对生命现实时具有的勇气，他表

明生命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教育，我们要在知识教育、能力教育的过程中实现价值观教育，使学生们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理想人格。这正是朱锐在哲学课堂上追求的境界：从“大我”的角度看待生命和学术，成为一个平凡而“大写”的人。他留下的这部关于爱与生命的哲学书，值得爱生活和爱智慧的人们研读与深思。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、教授）



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  
朱锐 著  
中信出版集团